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著

中國 改革開放 30年

ZHONGGUO
GAIGEKAI FANG
30NIAN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著

中國 改革開放 30年

ZHONGGUO
GAIGEKAIFANG
30NIAN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205-06456-3

I. 中… II. 中… III. 改革开放 - 成就 - 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4993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 × 240 mm

印 张: $31\frac{1}{2}$

插 页: 2

字 数: 388 千字

出版时间: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马 辉 董 喃 田 杨 张 洪

封面设计: 杨 勇 白 咏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蔡桂娟

书 号: ISBN 978-7-205-06456-3

定 价: 50.00 元

前 言

自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新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的任务，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经过 30 年的奋斗，到 2008 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中国人民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奋斗目标，正在为实现第三步奋斗目标而阔步前进。当人类社会迈进 21 世纪的时候，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景更加光明。

在 30 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上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这一飞跃的理论成果，而科学发展观则是这一成果的最新体现。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

“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就从而为在 21 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为展现改革开放 30 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总结党在这一伟大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我们撰写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一书。本书根据党的十七大的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比较完整、系统地记述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推向前进的奋斗历程。

对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将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前，即本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记述了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改革开放起步的过程；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即本书第四章到第七章，主要记述了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也遇到波折并加以克服的进程；第三阶段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始到上世纪末，即本书第八章到第十一章，主要记述了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发展，总体实现小康目标的过程。上一阶段到 20 世纪末结束，从 21 世纪开始，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由第十二章和结语两部分来记述。

本书的撰写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承担。参加撰写的人员如下：序章，章百家；第一章、第二章，孙大力；第三章，武国友；第四章，武国友、章百家、叶晖南；第五章，武国友；第六章，孙大力；第七章，章百家；第八章，武

国友；第九章，孙大力；第十章，武国友、章百家、叶晖南、孙大力；第十一章，武国友；第十二章，武国友、张学兵；结语，孙大力。章百家、孙大力对整部书稿作了统改、定稿。

记述这样近的、仍在行进中的历史，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 30 年中的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本书的写作只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初步尝试。书中对材料的运用、史实的叙述、判断的把握，主要以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有关论述和党中央的文件为依据，同时又注意吸收了近年来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但由于作者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周、不当之处。我们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及有关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以促进我们的研究工作。

作 者

2008 年 6 月

目 录

前 言	(1)
序 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	(1)
●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1)
● “两个凡是”的提出和对这一方针的抵制	(5)
● 国民经济的复苏和新的冒进的发生	(10)
● 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逐步恢复	(14)
第一章 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	(19)
●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
● 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	(22)
● 邓小平北方之行	(27)
● 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9)
第二章 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	(41)
●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	(41)
● 新“八字方针”和国民经济调整	(46)
●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	(53)
● 通过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	(60)

第三章 改革开放的起步	(71)
●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	(71)
● 农村包产到户的兴起	(82)
● 经济特区的建立	(87)
● 政治体制改革纲领的提出	(93)
● 党的整顿和组织建设的加强	(97)
● 改革在农村取得突破	(100)
第四章 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10)
● 党的十二大和开创新局面纲领的制定	(110)
● 调整外交方针, 实行全方位外交	(116)
●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	(126)
● 提出“一国两制”, 争取祖国和平统一	(133)
● 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148)
● 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	(153)
第五章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157)
● 全面改革纲领的提出	(157)
● 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162)
● 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173)
●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81)
● 科教文化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	(189)
● 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99)
第六章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波折	(206)
● 经济体制转轨中的矛盾	(206)
● 价格改革闯关受挫	(209)
●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的提出	(218)
● 1989 年政治风波的平息	(226)

● 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替	(233)
第七章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的实施	(240)
● 维护社会稳定, 抓紧党的自身建设	(240)
● 发展睦邻关系, 打破西方“制裁”	(246)
● 治理整顿的继续实施和改革开放的深化	(254)
● 治理整顿任务的完成	(264)
第八章 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275)
●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	(275)
● 迈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285)
● 加强宏观调控, 实现经济“软着陆”	(292)
● 继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299)
●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目标	(312)
第九章 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继往开来	(319)
●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19)
● 党的十五大,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331)
● 进行国企改革攻坚	(337)
● 农村改革的进一步完善	(345)
● 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350)
第十章 开展面向新世纪的各项工作	(365)
● 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365)
● 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375)
● 跨世纪的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384)
● 建立面向新世纪的对外关系格局	(395)
● 西部大开发, 加快民族地区建设步伐	(406)
● 总体实现小康目标	(416)

第十一章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423)

- 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423)
- 反腐倡廉，增强党拒腐防变的能力 (432)
- 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 (437)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贯彻 (441)

第十二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451)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与小康目标
 总体实现 (451)
- 党的十六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纲领的制定
 (457)
-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64)
- 继续推进军队国防建设、外交工作和祖国
 统一大业 (474)
- 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479)
- 党的十七大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继续前进 (484)

结 语 (492)

-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 “两个凡是”的提出和对这一方针的抵制
- 国民经济的复苏和新的冒进的发生
- 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逐步恢复

序 章

“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的中国

●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年像 1976 年那样具有戏剧性。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之后，人们的心境从大悲到大喜。对龙的故乡、龙的传人来说，这是个极不寻常的龙年。

1976 年 1 月 8 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

“文化大革命”后期，尽管周恩来的处境日趋艰难，但他事实上起着支撑大局、维系人心的作用。为使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能够尽可能正常地继续下去，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各种方式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费尽了心血。周恩来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北京十里长街出现了万人恸哭的悲壮的送殡场面。在“文化大

革命”造成的灾难已十分明显的时候，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位值得敬仰和信赖的领导人极度悲伤，更为党和国家的前途而忧心如焚。

4 月上旬，北京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天安门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一方面是由于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得人心。1975 年，邓小平在主持整顿工作时，同“四人帮”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涉及广泛的领域。这一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搞四个现代化，要不要发展生产力。整顿很快取得成效，全国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但是，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而对这些错误的政策和理论逐步地、有系统地纠正，必然会加剧正在社会上蔓延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情绪。因此，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不仅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1975 年 11 月，重病缠身的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随后，又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动乱，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水平已经同“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不相同了。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抵制，其结果是人们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清楚地看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决心奋起抗争。

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自 3 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人民也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深情，痛斥“四人帮”的罪

行，声势浩大，群情激昂。4月4日(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到二百多万人次。

4月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的事态。会议由当时根据毛泽东指定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主持。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这次会议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为它干扰了当时运动的大方向，决定立即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和决定迅即写成书面报告，送交毛泽东圈阅。

4月5日，群众发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走，气愤异常，同一部分执行任务的民兵、警察和士兵发生严重冲突。当晚9时30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在广场上的群众。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这次“天安门事件”鲜明地昭示了人心向背。它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在人民群众表达的对周恩来的深切悼念之情中，也包含了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拥护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伟人相继辞世。这三位伟人不仅是党、军队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党和国家主要的和长期的领导者。在失去最值得信赖的三位领导人之后，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人们，更为党和国家命运担忧。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他们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以党内“正统”自居，在报刊和广播中反复宣传。

“四人帮”肆无忌惮的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大多数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消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华国锋也认识到必须除掉这个党和国家的痼疽。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并决定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探知江青等被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密谋策划，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挽救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最后挣扎。党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控制了上海局势，使任何叛乱阴谋都不可能得逞。虽然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尖锐的，但并没有引发大的动荡。此后，中央又进一步采取措施，制止了河北保定等地区的武斗，全国局势逐渐走向安定。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从21日至24日，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人们普遍有一种重获解放之感，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希望。

^① “按既定方针办”：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写进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并广为宣扬。他们的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 “两个凡是”的提出和对这一方针的抵制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国积聚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担负国家领导责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各方面的工作要开展，党的自身要清理，党的优良传统要恢复；然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提出一条正确的方针、路线，带领全国人民迅速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误区中走出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要实现这样的历史转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场揭批“四人帮”的运动随即展开。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报“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号召全党紧密团结起来，对“四人帮”进行揭发批判。接着，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部署揭批“四人帮”的斗争。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此时发表毛泽东在1956年的这篇讲话，既是表达对他的纪念，也是为揭批“四人帮”提供理论指导。28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明确提出，揭批“四人帮”要经过三个战役：一、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二、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三、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按照这个部署，在此前后，中央批准转发了关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中央和地方报刊均用很大篇幅登载声讨和控诉“四人帮”罪行的文章。全国上下迅速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批判高潮。

同时，中共中央还陆续采取一些组织措施，加强和保证对党政军重要部门和全国各地的领导，以进一步稳定局势。

1976年10月下旬，由耿飆负责的中央宣传领导小组成立，统一领导整个宣传舆论部门。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常务工作。3月7日，中央通知由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对那些受“四人帮”影响较深、阻碍揭批运动开展的省份，如云南、辽宁、甘肃、安徽等，中央对原先的领导班子加以改组，另派得力的同志前去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展开，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首先遇到的也是当时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要求为1976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平反，要求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前一个问题是广大群众的普遍呼声。打倒“四人帮”后，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很快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和当时姚文元指使人歪曲事实炮制关于事件的虚假报道的经过，整理成调查材料报送中央。后一个问题首先在党内高层提出，但反映的是许多干部群众的心愿。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立即安排改善邓小平的处境，向他及时通报中央的决策，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建议，并得到李先念的支持。胡耀邦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即10月12日，托人给华国锋带去口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可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然会涉及更深层次、更加敏感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处理这种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需要超乎寻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眼光、胆识和威望。然而，这却是当时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所难以具备的。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一再要求“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

众，正确对待自己”；还要求“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他还就宣传部门的工作明确指示：一、要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四、“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也提出，凡是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按照这样的宣传方针，对于“四人帮”的批判只能沿袭“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整风的套路，强调批“极右实质”，而不提批极左，即使批也限制在“形左实右”；语言也是“文化大革命”式的，“四人帮”被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报刊上还一度出现整版的“批邓”文章。对华国锋的颂扬，也有不少过誉之词，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搞个人崇拜的一些做法。

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日益显露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1977年初，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全国人民再次自发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更加强烈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表达这种要求的大标语。“四五”运动中流传的诗词也被人们汇编成册，广为散发。面对广大群众的这两项要求，“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

“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最初的文字表达，出现在由汪东兴布置、为华国锋准备的一份会议讲话稿中。1977年1月21日写出的提纲中有这样的提法：“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由于原拟召开的会议推迟，这份讲话稿的主要内容就先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于2月7日发表了。这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